



## 1968

1968年初，77岁的老人戴高乐感到有些落寞。他说：“如今再没有什么棘手的事情要对付，也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我反而觉得没劲”。

戴高乐话音刚落，法国就出现了“红五月”。1968年5月，法国的大学生们纷纷罢课，大学集中的拉丁区筑起了几十处街垒，警察和学生间出现流血冲突。革命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工人开始罢工，从最初的几万人、到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法国几乎瘫痪。戴高乐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的国际声誉达到巅峰、政权极其稳定、经济一片繁荣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场动荡。一向坚强不屈的戴高乐突然感到自己老了。他说：“这是一股激流，我无力掌控它。激流不可能握在人的手中，我无能为力了。”1969年4月，戴高乐宣布辞去总统职位。失去权力的政治家容易迅速衰老。1970年11月，离他的八十周岁还差两周，戴高乐溘然去世。

尼克松说，戴高乐是法兰西的解释人、保护人和先知先觉者。戴高乐是20世纪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最令人着迷的是，他本人的性格和法兰西的性格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法国是一个积弱的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被敌军占领，几乎灭国。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努力想维持帝国的荣光，先在越南打了一仗，失败了，丢了印度支那半岛，后来又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一仗，再次失败，丢了阿尔及利亚。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美、英、俄、中都是打出来的，只有法国是后来被邀

请进去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出了一位最傲慢自负的领袖。美国人发牢骚，说想不明白一个伸手乞讨的家伙为什么还摆得出来这么大的架子。

一个民族选择她的领袖，犹如少女挑选自己的情郎。往往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女孩，会去找最粗犷豪迈的男子汉。法国人拥护戴高乐，是因为戴高乐能给他们缺失的东西：秩序和繁荣。戴高乐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成功的避免了一场内战。战后法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44年法国的人均收入只有1939年的一半，到1949年已超过战前水平，1955年比战前高峰时期高1/3。高速增长的动力不仅来自战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重建，而且来自新兴的现代工业。汽车、电视、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纷纷涌入寻常百姓家。到60年代中期，大约一半法国家庭都有了自己的汽车，几乎普通家庭也拥有电视。有史以来第一次，舒适和安逸成了大多数欧洲人触手可及的东西。

沃尔德说过，世间有两种事情最痛苦，一种是求之不得，一种是求而得之。法国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也开始感到厌倦和不满。新一代人走上了历史的舞台。1945到1952年间出生率激增，出生在这一代的人们没有经历过饥饿、贫困和战争，但他们却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化。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水桶能够产生强大的向心力，一旦这种力量消失，随时会出现背道而驰的力量。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塞尔旺-施赖伯说：“戴高乐来自另一个时代，是上一代人”。和平年代的法国，了无生趣、死气沉沉，政治的鸿沟宽广幽深。一边是魁梧高大、不苟言笑的戴高乐，一边是懵懵懂懂、渴望自由的年轻人。

马克·科兰斯基在《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一书中说：“在化学中，有些非常稳定的元素如果和其他表面上不活跃的元素结合起来，会突然产生爆炸。”这就是法国的情况：沉默无聊的社会、阴郁衰老的领袖、不满现状的年轻人、渐渐令人厌烦的消费主义，再加上无聊本身，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革命。

导火索是在巴黎郊区的南泰尔大学。这是一所刚刚建校四年的新学校。法国在二战之后想努力推广大学教育，大学生的人数剧增。10年之内，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1倍多，从1958年的20万增加到1968年的50万。由于市中心的校园人满为患，就在西郊的南泰尔市建了一所新的大学。南泰尔大学的周围是一片简陋的工棚，住着来自北非和葡萄牙的移民。一道围墙，圈起来一万多名骚动不安的学生。这里不像巴黎的拉丁区，没有咖啡厅，也没有剧院，唯一的活动场所就是宿舍，男生和女生还不许串

门。但到了晚上，常会有女生从门房的柜台下面偷偷溜进男生宿舍。1967年3月，一群学生占领了女生楼，还叫来了记者，抗议学校禁止男生进入女生楼的规定。

1968年1月，南泰尔大学的游泳池落成，法国青年与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应邀参加剪彩仪式。一位红头发的犹太学生科恩-本迪克凑过去，跟部长先生借了个火，点着一根香烟，漫不经心的问部长：“我读过您的青年白皮书，为什么里面根本就没有谈到性的问题？”部长大人不屑的说：“要是你有这方面的问题，跳到游泳池里就能找到发泄。”科恩-本迪克马上高声叫道：“听，希特勒青年团也会像你这样说的”。

南泰尔大学的学潮如干柴烈火，燃烧起来。1968年5月初，法国政府决定关闭南泰尔大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决策错误。当偏僻的南泰尔大学关闭之后，这群郊区的学生马上把阵地转移到了热闹的巴黎大学。极左派的学生要在巴黎大学举行聚会。校方担心极右派的学生会捣乱，因此请警察到校园里维持秩序。这又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你可以设想，当一群群情激昂的学生，突然看到进来了一批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之后的反应，就像公牛看到了红布，他们更加亢奋、暴躁。

警察带走了一批闹事的学生，学生就冲到了街上。当时，巴黎有很多街道还是鹅卵石铺路。学生们马上发现，可以在街道上修筑街垒，和警察对抗。修筑街堡，创造了一种兴奋、友爱和节日般的气氛，尤其是在男孩和女孩之间，建立了一种崭新而单纯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市民也被吸引起来，巴黎沸腾了。街道变成了狂欢的剧场。就像在马戏团看小丑的表演一样，越是胡言乱语，越是能得到听众的喝彩。到处都是狂热的人们，到处都是标语、海报、传单和宣传小册子。有一张海报上画的是戴高乐的阴影捂住了一个年轻人的嘴，配的文字是：年轻人，闭嘴！

如果要让年轻人敞开来发言，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呢？有一个标语写到：“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另一个标语写到：“操你妈的母校”。写在圣西尔学院墙上的一句话或许最能代表许多人的感受：“我想说些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本来是因为社会太乖了，就干脆和他开个玩笑，但这场运动慢慢就变得越来越暴力。学生到处发传单，教大家怎么做燃烧弹。警察们天天站在那里，忍受着学生的嘲弄和辱骂，以及铺天盖地而来的投掷物，也逐渐失去了耐心。一旦跨过了临界点，狂欢就变成了暴力。5月24日，学生、市民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位作家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圣日耳曼大街的街垒燃起来熊熊大火。巨大的瓦斯云在圣米歇尔大

道散开。在大道的高处，一团催泪弹像火球一样落下来。大火升上了天空。”汽车被烧毁，股票交易所被点燃，很多商店遭到抢劫。

当巴黎城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戴高乐反而跑到罗马尼亚访问。政治家们只喜欢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处理学生问题显然不是戴高乐的专长。在戴高乐总统出访期间，蓬皮杜总理主持政务。他立刻同意满足学生们的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学生，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危机并没有因此立即消散，但蓬皮杜清醒的知道，在这样的关头，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政府摆脱一种冷漠、强硬的坏名声，迅速的扭转公共舆论的导向，然后再伺机化解矛盾。

即使在蓬皮杜做出了巨大让步之后，危机还在继续恶化。工人开始罢工。从南方飞机制造厂到雷诺汽车公司，各地的工人罢工层出不穷。5月中旬，爆发了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工会的参与将学潮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蓬皮杜隔岸观火，对背后的形势看得真切。他说，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共产党的策略就是“登上开动的火车，再把老司机赶走”。

那个果断勇毅、雷厉风行的戴高乐突然不见了。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不在于他不理解学生。的确，一个 77 岁的老人，怎么可能理解青年学生呢？问题在于，一个崭新的时代要开始了，但新的时代，正是要靠抛弃原来的权威和领袖才能降生。

戴高乐看起来疲惫不堪、说话也闪烁其词，但最后，“伟大的夏尔”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提议举行全民公投，让整个法国决定，他们究竟想要什么。一开始，大家以为这不过是老政治家的幻想。尤其是，各地的风潮仍不断发生，不要说公投了，就连印刷公投的选票和宣传小册子都做不到。但到 6 月之后，骚乱已经渐渐平息。6 月 24 日的公投中，戴高乐主义者赢得了 43% 的选票，在一周之后的第二轮投票中，他们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多数。戴高乐的冒险又一次押对了宝。

法国历来有革命的传统，但 1968 年的五月风暴并不是一场革命。它没有纲领，也没有组织。在大学生运动中，各种派别林立，互相都不服气。极左势力中有毛派，但毛派中又有派别。法国大学生心目中的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呢？一些从未服过兵役的毛派大学生开始认真学习毛选，做笔记、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甚至制定了游击战策略，先占领地铁，再建立大后方。但巴黎大学的学生标语中也有一条提到：“毛主席教导我们，性是好的，但不要过度”。除了毛派，还有托派，以及法兰西解放运动的

绝对自由派和纯粹发泄的“欲望派”。学生和工人之间也没有紧密的联盟。大学生们到工厂里面动员大家，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但工人最听得进去的是不要工作了，及时行乐吧。少数和大学生走得近的工人，最后融入了左派知识分子的队伍，成了记者、作家，但更多的工人事后发现上当了。当罢工结束之后，他们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1968年的法国，就像一个在高速路上开车的司机，他突然连转向灯都不打，猛的向右开去。就在你以为他可能是要拐到出口，开上另外一条路时，他又突然踩了一脚刹车，猛的朝左掰出来，若无其事的继续朝前开了。在最繁荣和平的时候，法国突然爆发了“五月风暴”。就在法国这样一个革命一定要革到底的国家，“五月风暴”却忽然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1979年，法国作家让·福哈斯蒂耶写了一本书，叫《伟大的辉煌：看不见的革命（1946-1975）》。在战后三十年的岁月中，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过是寒风中的一个冷战。

有时候我想，历史中的一些片段，根本就不是让我们分析和解释的，而是让我们感慨的。

声明：本报告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